



改革开放研究丛书

主编：蔡昉 李培林 谢寿光

2018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中国经济特区 发展

1978~2018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陶一桃 鲁志国 等 / 著

卷之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经济特区 发展

1978~2018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陶一桃 鲁志国 等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 1978-2018 / 陶一桃等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9
(改革开放研究丛书)
ISBN 978-7-5201-2891-9

I . ①中… II . ①陶… III . ①经济特区－经济发展－
研究报告－中国－1978-2018 IV . ①F127.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6157号

· 改革开放研究丛书 ·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1978~2018）

丛书主编 / 蔡昉 李培林 谢寿光
著者 / 陶一桃 鲁志国 等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周丽

责任编辑 / 高雁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 字 数：295千字

版 次 /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891-9

定 价 / 9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018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出版者前言

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社会各界都会举行一系列活动，隆重纪念改革开放的征程。对40年进行总结也是学术界和出版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可以反映40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成就与发展经验，梳理和凝练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面向全世界进行多角度、多介质的传播，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改革开放研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应该长期坚持并具有长远意义的重大课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是直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文社会学专业学术出版机构，依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界丰厚的学术和专家资源，坚持“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的出版理念、“权威、前沿、原创”的产品定位以及出版成果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市场化经营道路，为学术界、政策界和普通读者提供了大量优秀的出版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改革开放研究丛书第一辑，内容涉及经济转型、政治治理、社会变迁、法治走向、教育发展、对外关系、西部减贫与可持续发展、民间组织、性与生殖健康九大方面，近百位学者参与，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九种图书后来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和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资助，由荷兰博睿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图书的英文版已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著名大

学收藏，进入了国外大学课堂，并得到诸多专家的积极评价。

从 2016 年底开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次精心筹划改革开放研究丛书的出版。本次出版，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大领域为抓手，以学科研究为基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为支撑，以国际视野为导向，全面、系统、专题性展现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经验积累、政策变迁，并辅以多形式宣传、多介质传播和多语种呈现。现在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这套丛书的中文版，我们希望借着这种形式，向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进程及其所开创的这一伟大时代致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2 月 10 日

主要作者简介

陶一桃 满族，中国经济特区问题研究专家。1989 年于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胡寄窗先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会评专家、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深圳市国家级学术领军人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省《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社科联委员。历任深圳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等职，现任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院长，深圳大学理论经济学学科带头人、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中西方经济思想与理论研究，研究领域涵盖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制度经济学等。近二十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国改革开放思想史、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史以及中外经济特区、中外自贸区、湾区比较研究，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其代表性著作《中国经济特区史论》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35 本重点书系之一，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并由英国帕斯国际出版公司英文出版发行，2011 年该书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主持编撰《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国双创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国“一带一路”与湾区发展报告》（蓝皮书）；主编学术集刊《“一带一路”研究》。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研究”，其成果

《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一书入选2016年法兰克福书展，由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发行；2017年入选国家“两个工程”项目，由埃及斯福萨法出版社阿拉伯文出版发行；2017年列入俄罗斯科学院涅斯托尔出版社出版计划，俄文出版发行。目前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史——1978至2018”。

曾为越南、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俄罗斯远东地区、南非、卢旺达、巴布亚新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做特区、自贸区发展规划及咨询。

鲁志国 浙江舟山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深圳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理论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教学名师，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西方经济学”广东省级教学团队带头人，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微观经济学”主持人，广东省本科高校经济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广东经济学会理事，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计划预算审查监督咨询专家。

长期致力于西方经济、特区经济、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CSSCI、新华网全文转载或索引；出版专著及合作完成学术著作（教材）10余部；科研成果获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内容提要

本书以历史脉络为主线，以事实和事件为依据，沿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间进程，将经济特区 40 年来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每个发展阶段分析论述经济特区建设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国际合作等内容，并着重阐述每个发展阶段的历史背景、状况与特点、功能与使命、政策与实施、发展与成就、问题与挑战，以及对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总结，全面讲述中国经济特区 40 年的发展故事。

全书共十章。第一章讲述中国经济特区酝酿与创办的时代背景；第二章围绕特区创办和早期探索的几个重大事件，还原经济特区酝酿、决策、产生与早期开发建设的艰难过程，记述经济特区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历程；第三章将经济特区的市场经济探索和实践置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发展、完善的进程中加以梳理和记录，阐述论证经济特区的创新实践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第四章全方位再现和还原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事件，并就邓小平南方谈话对经济特区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进行归纳论述；第五章梳理总结经济特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分析阐释经济特区给全国各地带来的示范效应和示范价值；第六章考察经济特区发展的“二次创业”之路，分析各经济特区差异发展的状况及原因；第七章阐述经济特区在各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及发展历程，揭示经济特区是在转型和发展的辩证统一中不断成长的；第八章通过对经济特区创新之路的介绍，分析经济特区创新的深层动力，展现经济特区超越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建设成就和文化风貌；第九章提出新兴经济

特区与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传统经济特区的延伸和拓展，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区域引擎，可以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第十章解析经济特区在新的发展时期和发展形势下有新的历史使命，新时代的经济特区肩负着引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及现代化国家的重任。

从经济特区谈中国道路的实质与内涵（代序）

陶一桃

这里所说的中国道路，是指 1978 年以来中国所选择的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与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与路径。具体地说，就是在一个传统意识形态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大国里，在区域及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的贫穷国度中，以创办经济特区为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突破口，旨在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国家的力量和执政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与勇气，在原有体制内部逐步完成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使中国经过独立自主的全方位改革开放，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制度自信、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民生幸福的法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①

中国道路是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又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实现现代化之路，其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其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道路的形成过程，既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更是一个用观念战胜观念的过程。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潜能的“渐进式改革”，在逐步实现社会转型中保障着稳定，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着均衡，在发展繁荣中走向共享。而这一切又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鲜明特质。相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所选择的道路，中国道路不仅以其自身的成功实践证明了自身选

^① 陶一桃、鲁志国：《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总论”，第 1~8 页；陶一桃：《深圳印证中国道路》，《南方论刊》2014 年第 6 期；陶一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2012 年 10 月 30 日《深圳特区报》。

择的正确性，而且还探索出一条转型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可借鉴的发展方式与路径。

所以说，对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的思考与研究，不仅是对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与现实的探索，同时是对 40 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演进历程的研究，对中国制度变迁路径的研究，对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的研究。^①因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所走过的艰辛而辉煌的历程，就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由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就是由盲目闭关自守走向全面政策开放与制度开放的过程，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而美好的征程。而这一切不仅始于经济特区的创立，同时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实质与内涵。

一 关于中国道路的学术讨论

这里所谈的中国道路，无疑是一个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之下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它既不是曾经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走过的那条道路，又不是可以被直接照搬或借鉴的既有模式。它的形成既需要向传统意识形态挑战的胆识与智慧，又需要勇于改革的大无畏精神与气概。所以对中国道路探索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用观念战胜观念的过程。

关于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问题，不仅为学者所普遍关注，更是几代政治家和有识之士为之终生奋斗的理想所在。我们曾有过“师夷之长以制夷”的真诚与无奈，更有过“超英赶美”的狂热与尴尬，但目标与实现目标道路的南辕北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所选择道路的正确性。有学者比较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主要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点后指出：19 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相结合，经历数百年自然演进而形成的。其中私有制、市场导向和逐渐变革是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20 世纪以来，一些经

^① 陶一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2012 年 10 月 30 日《深圳特区报》。

济落后的国家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效仿激进改革的苏联模式，并以同样激进的政治革命为先导，通过具有显著革命性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工业化进程，希冀在具有无限革命情怀的纯粹公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计划和激进改革的力量快速实现现代化。但是，这一苏联式的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在经历了短暂而狂热的成功之后，便陆续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中国社会也受到波及。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凭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集体智慧与胆略，中国社会才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寻中找到了一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实现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规划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以创办经济特区为起点，以改革开放为宗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以全方位社会改革和全面发展为方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道路。^① 这条道路不仅被几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不断丰富、发展、完善，而且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实践、检验与印证。

1. 关于中国道路的起点问题。可以说关于中国道路的起点问题，是这里讨论的时代前提，因为对它的厘定不仅具有史学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探索价值。我认为，今天所谈的中国道路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和独特背景的特定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共运史或党史的概念。百年以降，中国人民一直在孜孜寻求民族独立、科学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道路。无论是从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开端的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还是从标志着新中国诞生的 1949 年算起，中国人民都是沿着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奋斗着、前进着。但是，中国历史上曾经走过的道路与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的道路并不是一个意义上的道路。所以这里所谈的中国道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广义地理解为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

^① 陶一桃、金传：《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10 年第 1 期；陶一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2012 年 10 月 30 日《深圳特区报》；陶一桃：《深圳印证中国道路》，《南方论刊》2014 年第 6 期。

命与建设的近 120 多年的中国近代史。^① 另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有 30 年的时间我们是虔诚地学习、实践着苏联模式，并不是走着自己特有的发展道路的。而对以苏联模式为典型代表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大前提，也是中国道路形成的重要前提。正因如此，无论从逻辑还是从理论与现实意义上来说，我们都不能把被“否定”的东西当作一种继承来保留，更不能把改革看作对“被改革”的“发展”。我赞同中国道路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的时间划分，正如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珀先生所说：当我们谈到中国道路的时候，主要是指中国在过去 30 多年里的发展和一系列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其《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一书中也把中国道路称为中国独特的改革开放之路，并称这条道路是“发展转型”与“体制转型”双重转型之路。

2. 关于中国道路讨论的前提问题。我认为摒弃极“左”的意识形态和冷战的思维方式，是探讨中国道路问题必须明确的意识形态前提。因为我们绝不可能再回到“姓资姓社”的教条主义思维模式上去，否则将是一种历史倒退。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而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 1992 年初邓小平南方视察时做出的斩钉截铁的历史性判断：“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只有“不争论”，才有向世界展示出另一条发展道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发轫；只有“不争论”，才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与完善；只有“不争论”，才有以先行先试为使命的经济特区的创立与发展；只有“不争论”，才有创造无限奇迹的中国道路的探索与实践。所以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大可不必耿耿于怀，更不要简单地把“历史终结论”看作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某种战胜。因为“历史终结论”的现实依据是苏联的解体，并

^① 陶一桃、鲁志国：《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总论”，第 1~8 页；《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特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比较与借鉴——2014 中国经济特区论坛观点综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15 年第 1 期。

非资本主义的胜利。所以我认为，把“历史终结论”理解为宣布传统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结束更为客观。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这位一直关注中国社会转型的西方学者的另一些观点。如他曾说：美国不能决定民主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产生。要明确的是，如果一个国家不需要的话，外人不能将民主强加其身。有关民主和改革的需求必须来自国内。因此，民主水平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时机逐步成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有赖于政治和经济的逐步完善。他还指出：“发展并非由富者赠与穷者，而只能由穷者自己达成。”福山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的访谈时对“历史终结论”和中国发展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如下的回应：美国需要向中国学习。但同时认为，由于中国模式源自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所以在世界其他地区不可复制。从福山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断言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点，但并没有否认中国改革开放所选择的道路及其意义与价值。

3. 关于是否存在中国道路的争论。有学者认为：如果把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置于现代化国家构建的理论框架中，由于当代中国大陆尚未完成现代化国家的构建，当下形成的独特制度组合缺乏足够稳定性和可扩展性，因而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当然也就无所谓中国道路。我更愿意把是否存在中国道路的争论，理解为看问题的角度或方法的不同。首先，中国道路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不能因为模式尚未形成，就否定道路的存在。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无论是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由曾经的普遍贫穷向今天的共同富裕的迈进，还是 40 年发展的辉煌成就和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的创造，都是中国道路的生动体现与折射。所以，上述观点用来说明不存在中国模式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但由此否定道路的存在则未免有些武断。其次，我并不完全认同中国模式的提法，因为模式本身具有制度的固化性与范式性的内涵，对于还处于探寻、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来说，还有许多开拓性的实践等待探索，还有许多制度变迁有待发生。我们并不是在制造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范式，而是在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

路径。或许模式尚未形成，但对道路的探索早已开始。这条道路在40年的砥砺前行中已经日渐清晰并逐步形成。

二 经济特区与“渐进式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征，同时“渐进式改革”又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鲜明特质。“渐进式改革”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潜能；以经济改革为切入点，以全方位改革为方向；以发展经济为着眼点，以全面发展为目标；以非均衡发展为路径，以协调共享发展为宗旨。这一改革的逻辑路线从一开始就通过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前行轨迹。

1. “渐进式改革”的实质。从理论上说，“渐进式改革”是一种建立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之上，在一个宏观经济相对平衡稳定的国家中进行的由政府主导的逐步扩展并深入的市场化改革。这种制度变迁突出表现为进行改革的国家充分利用已有的社会组织资源，尤其是国家力量，发起、推进社会改革，具有新旧体制并存的双轨过渡的过渡性和政府主导的强制性中的诱致性的特点。从改革的进程来看，呈现出鲜明的由局部到整体，以及体制内强制性制度变迁与体制外诱致性制度变迁相互推进的显著特征；从改革的内在逻辑演进来看，表现出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协调，以及以先行的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特质。^①

“渐进式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发展经济入手的，它成功的关键在于首先以特殊政策的力量，调动了社会个体对创造财富的渴望，肯定了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正当性，给予个体致富的空间与传统体制内无法拥有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正是这一转型模式的内生机制，在给予了人们选择的权利和

^① 王曙光：《转轨经济的路径选择：渐进式变迁与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6期。

自由发展的可能的同时，充分调动了市场经济主体——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因此赢得了人民对改革的广泛支持与热情参与。

2.“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渐进式改革”无疑是相对于“激进式改革”而言的。作为不同的改革方式，实质上喻示着不同的改革道路或路径选择：首先，“激进式改革”更注重整体改革的先行性，有破釜沉舟、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气概。在实际进程中往往是先搞改革、后求发展，并通过人为降低发展速度来推动改革。而“渐进式改革”则更注重经济改革的先行性，以发展促改革，以改革谋发展。既要坚定不移搞改革，又要励精图治谋发展，从而用经济的稳定增长，来支持坚定的社会改革。^①其次，“激进式改革”基本上是以“破”字当头，即先破后立，采用“休克疗法”，首先彻底破坏计划经济体系和国有制度，然后进行新体制建设，结果在很多情况下造成体制的“真空”状态。而“渐进式改革”则基本上是以“立”字当头，先立后破，在改革过程中不断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同时，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在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情况下，不断减少指令性计划。在使传统体制功能和权力收缩的同时，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逐步形成、扩张、完善，从而既避免了体制的“真空”状态，又让一个崭新的体制在不断被改革的原体制内逐渐产生、完善并发挥越来越强大的功能。^②最后，“激进式改革”更看重速度，力求速战速决。如俄罗斯改革始于1990年8月制定的“500天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渐进式改革”则更看重稳健，坚持循序渐进，逐步实施。其典型做法是以非均衡发展的战略，通过局部“先行先试”的方式各个击破，从而通过边际均衡破解难题。即通过建立经济特区以及政策性“增长极”的形成与“扩散效应”的发挥，以非均衡发展的方式逐步实现全方位改革和全面发展。

^① 王曙光：《转轨经济的路径选择：渐进式变迁与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6期。

^② 王曙光：《论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现代经济学大典》（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第237、238页。